

# 清末贵阳“信息出山”旧事

## 辗转进贵州

福建籍诗人陈季同《出贵阳小西门见电线》二首，以其亲身见闻，引出了一段清末贵阳“信息出山”的旧事。早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冬，即有人在贵阳市郊看到“一线高悬似彩虹”“一线有丝情不断”。



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英文名 Tcheng Ki-tong，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一个晚清文化史和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很有建树的人物，其与辜鸿铭、林语堂被并称为世界文化交流的“福建三杰”。曾以外交官身份在欧洲生活十六年，多用外文创作，翻译亦有成就。著有《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吾国》《一个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人》《黄衫客传奇》等多种作品，创办《求是报》《南洋官报》《南洋日日官报》等多种报纸，在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他还创办了“戒烟公会”和“兴亚会”等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新兴社会组织，更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创办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季同与两位外国矿师来贵州探矿。5月，陈季同等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到达汉口，再从汉口入洞庭，沿沅江到辰溪入黔。到达镇远青溪矿局后，陈季同在镇远、施秉、黄平、清平（今炉山）一带考察了数月。到10月，陈季同一行才经福泉、贵定、龙里来到贵阳，再辗转到遵义、黔西、毕节，过赤水河入四川，复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回汉口。

此行，其自称为“黔游”。实际上，那时的陈季同已经被贬官，并且负债累累。其应邀到贵州来探矿，主要是为青溪铁矿就近寻找煤源，同时也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商业机会，搜寻铅汞等矿产。

这位曾经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优雅地夸夸其谈的外交官，跋山涉水，日晒雨淋，穿行在黔东南的崇山峻岭之间，行走在湘黔、川黔古驿道上，一路走，一路诗……其所到之处，吟哦唱和，留下了数百诗篇。其“黔游”三四个月的诗作，有的怀古思乡、忧民忧国、针砭时弊、袒露襟怀，有的应景写意、流水记事、格物致知，后汇编成《黔游集》。关于《黔游集》，后世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说其《黔游集》定稿后更名为《学贾吟》行世，一说其《黔游集》已经散佚。但实际上，《学贾吟》系以其“黔游”诗作为主，兼收少部分其他诗作。

## 关于《学贾吟》一书

陈季同旅欧十六年，后世多有考究，成果斐然。但其1896年的“黔游”历来却鲜见学界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实际上，其数百首在黔所见所闻、所感所记的“黔游”诗作，特别是其独一无二的贵州“矿诗”，对研究清末贵州的风土人情、人文风物等，都极具史料价值。诗作是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历史文献。

其《学贾吟》曾长期“埋藏”在上海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后来有幸被学者发现时，已经是百年后的事。2005年10月，钱南秀整理的《学贾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2011年12月，沈岩校注的《清代陈季同〈学贾吟〉手稿校注》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公开出版。今天，我们才得以一窥陈季同的黔游诸诗，包括《出贵阳小西门见电线》二首。

陈季同由湘入黔，又由川出黔。贵阳，是其结束探矿后返程时经过的一站。1896年初冬，陈季同在贵阳看到电线，惊呼之余写下了《出贵阳小西门见电线》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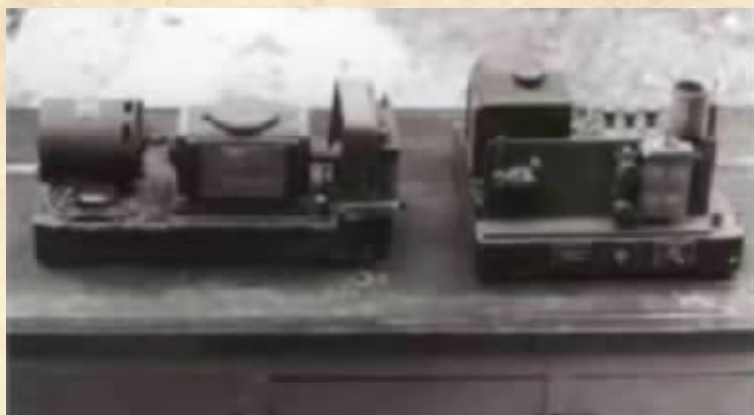
（一）  
顷刻音书匝月通，尘寰若隔马牛风。  
三竿重见如冬日，一线高悬似彩虹。  
岂亦牵情连不断，未能免俗半凌空。  
路旁过客抬头问，又为何人达苦衷。

（二）  
忆从汉上别芳踪，迢递关河隔万重。  
一线有丝情不断，三湘无地足能容。  
几回欲把乡心诉，今日何殊知己逢。  
我自乘舆君架木，庸中矫矫孰游龙。

诗人还特地自注：“汉口买舟而后，一路未见电线。中国各省均设电报，唯湖南不设，今犹缺然”。所以，在贵阳见到电线，其自然十分高兴。从陈季同的自注不难看出，其所看到的“电线”并非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传递电能”之线，而应为“电报通信”之线。当然，陈季同肯定不是第一个看到贵阳“第一条电线”的外来人，但他却是用诗记录贵阳这一划时代性巨变的为数不多的外来诗人。

百年后读陈季同《出贵阳小西门见电线》二首，眼前依然可以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市郊外，一根根木杆子上，粗大笨拙的电

至上个世纪40年代，贵阳地区仍在使用的韦斯登收发报机



报线，在广阔的荒野上显得那么纤，那么细。木杆与木杆之间的距离不算远，但电线依然垂成一个半弧形，寥寥地延伸向远方，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市区内，电报局柜台前，三三两两的人们焦急地等待着那几个字经过人工操作的发报机传向山外。那一刻，西南云贵高原大山深处的贵阳，仿佛离山外的世界很近，很近……似乎就是一根电线的距离。

## 一线有丝情不断

一根电报线，打开了贵阳信息革命的窗口。

电报通信技术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80年代才创设电报局并大规模架设电报线。因中法战争的通信需求，1886年12月至1887年3月，清政府开工架通了由蒙自经省城昆明、宣威到贵州毕节的电报线，并设立毕节电报分局，首开“云贵有线电报”之先河。毕节电报分局设在贵州，却隶属于云南，管理权亦在云南。

时任贵州巡抚潘蔚奏请清廷“经由毕节县，分设子线”入黔，向东延伸至贵阳。1887年4月27日，获光绪帝批准。5月，即完成从毕节经大定（今大方县）、黔西（今黔西市）、清镇至贵阳的省内第一条电报线路，并设贵州电报局于省城巡抚衙署内，贵州借此成为全国较早建成电报线路的省份之一。资料记载，这条电报线采用的是“八号大线”，线路全长“四百五十里”。贵州电报局在贵阳设立之初，仍隶属于云南电报局，此即“滇黔合筹”。后来，贵州电报局“修养费用，皆归黔发”，划归贵州自行管理。

潘蔚（1826—1894），初字燕山，后改伟如，号铎园，晚号心岸，江苏吴县人，官至贵州巡抚。光绪十一年（1885），潘蔚奏请开采贵州矿产，开启了贵州近代化之门。这样一位开明的“父母官”主政，其当年力主架设贵州第一条电报线，首开“贵阳有线电报”之先河，也就不足为怪了。邻近的湖南，更近中原，但到1896年尚未设电报。相较之下，1887年贵州巡抚潘蔚即主动奏请架设入黔电报线路，这是有相当先见之明的。

众所周知，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首开“使用电报传圣旨”的先河，此即“嗣后明降谕旨，均着由电报局”。那时，距贵阳拉通电报线路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年头。“黔省地属边疆，缴文报濡滞……”，这或许才是潘蔚当年急于拉通电报的主要原因。

邮传方面，光绪二十七年（1901），贵阳设立副邮政总局（大清贵阳邮政局），这是贵州最早的邮局，也是贵州近代邮政的开始。二十七年（1903），贵阳被增设为副邮界。三十三年（1907），贵阳邮务区设立。

同期，电信方面，光绪三十三年（1907）

设立黔西局，有裸线240里至贵阳。宣统元年（1909）又设立安顺巡房，有裸线142里至贵阳。宣统二年（1910）架设贵阳至湖南洪江的电报线，全长685里。自此，从贵阳出发的电报线路，可通东（湖南）、西（云南）两个方向。

时人记录了当时贵阳的邮传、电信状况。《清末民初的贵州邮传工商点滴》引《万丈章遗稿》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我入省学师范，见十字街有邮局，门可罗雀。楹联云‘置邮传命，为政在人’，问知是西洋新法，每信重三钱，贴票一分，取钱才二十文，半月可通行一次。辛亥革命时期渐快，亦一周通行一次。电信则设置于抚院内，先通北京，然清帝及太后死，亦三日始闻”。皇帝太后死亡，如此重大的信息，其周折、延缓的时长竟然以三天计，可见当时电信水平的落后程度。不过，相较此前的“顷刻音书匝月通”来说，已经算是长足的进步了。

实际上，清末贵阳开通的电报业务量很有限，主要是服务于政务公文的上传达以及军用。一句“设置于抚院内的电信”，足以说明当时贵阳电信的商用和民用基本上还未普及，更未面向社会铺开，因为巡抚衙署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办公的场所。

当然，后来逐渐也有商、民“搭官用报便车”的。资料统计，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的三年间，整个贵州发出官报、公报、私报总共13122份，平均每年4374份。三年间发出电报总数为40.8万字，平均每年13.6万字。

宣统二年（1910），贵阳副邮界升格为独立邮界。同时，贵州境内邮务全部统一归拢在贵阳邮政总局管理之下，标志着贵阳地区官方通信和民间通信被共同纳入近代邮政范畴。换言之，在形式上，贵州已经进入近代邮政时代。

1912年进入民国时期，贵州全省电报从业人员已经达到131人。次年改组全国邮区，贵阳邮政总局改为贵州邮务管理局。到1918年，贵州全省共有邮局43个，代办所53个。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挑马驮为主的邮路交通、货运物流依然在延续，直到公路开通后才逐步为汽车所取代。

到1930年，贵州共有电报局30处，几乎覆盖了全省大部分地区。以贵阳作起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可以向外拍发电报。电报机械设备，亦从原始的莫尔斯人工报机，逐步向韦斯登自动机过渡。

总之，清末民初电报线路的拉通和普及，以及此后公路交通的兴起，标志着古驿道上传统“邮驿”“站赤”使命的逐步终结。从此，贵州省告别了千年来靠快马加鞭穿梭在崇山峻岭中的驿传历史。

据《贵阳文史》（作者姜文斗）